

屈辱与启蒙

——由“假洋鬼子”的辫子探鲁迅的创作动因

□李永东

内容摘要 剪辫在半殖民中国除了与革命造反相联系,也意味着归顺西方的身体话语,从而成为现代启蒙观念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立场与“假洋鬼子”的辫子之间,有着内在的隐秘联络。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清国留学生之类的人物,又是民众与守旧人士加在他身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作品的启蒙叙事交织着悲哀与愤懑的心绪。

关键词 鲁迅 假洋鬼子 辫子 启蒙 屈辱

作者 李永东,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重庆400715)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709103)

一

1903年的秋天,剪辫后的鲁迅从日本回绍兴,途经上海时,特意花了四元大洋(也有说是二元)买了一条假辫子带在身边。到家时,首先迎接他的是三弟周建人,周建人“只看见一个外国人,从黄门熟门熟路地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大哥^[1]。因剪了辫子,鲁迅无论露短发或戴假辫,穿洋装还是长衫,都是众人围观、嘲笑的对象。他在绍兴街上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2]、“里通外国”的人^[3]。后来鲁迅进入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还背着“假洋鬼子”的恶名。有意思的是,鲁迅后来在小说中同样对“假洋鬼子”进行了嘲笑。

“假洋鬼子”嘲笑“假洋鬼子”,这种文化现象看起来是如此吊诡。如何解释这种吊诡的现象?吊诡的背后,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境遇与文化体认,映照出半殖民中国“向西转”的文化进

程充满了曲折、争议和尴尬。

“假洋鬼子”是指接触过洋人或西洋文明,有着崇洋心理,并刻意模仿洋人装扮、做派和观念的中国人。“假洋鬼子”作为半殖民中国的人物类型,有着特殊的身体修辞。近代“假洋鬼子”最凸显的身体标识,当属那条可以随时戴上、拔下的假辫子。“假洋鬼子”原本具有新旧、中西两副面孔,随时可以变换,而变换的重要手段就是在辫子上玩花样。在辫子上玩花样,玩的不是审美,而是种族意识、文化冲突和身体革命,辫子的变换赫然印着近代中国改朝换代的一部“血史”。汉族剃发留辫,始于满清,“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辫子提醒着“满汉的界限”^[4],是“羞耻与归顺”的民族标识^[5]。因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近代革命,把剪辫作为革命者身体的象征符号。除了革命者和声援者,也有许多人被胁迫在这场革命中表态,从而被剪掉辫子,七斤(《风波》)、钱少爷(《阿Q正传》)、刘齐礼(《文明小史》)的辫子,都是被人强行剪掉的。



剪掉辫子是对满清政权、封建秩序最显眼、最具舆论效力的挑战,为此也遭遇了严酷的杀戮和惩罚。从傅国涌的考察中,可领略到近代剪辫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沉重血史^①。

剪辫运动属于近代革命的一部分,但推翻满清帝制后,中华民国并没有要求国民恢复汉族的古老发式,而是以西洋人的现代发式置换了满清的发式。这样一来,剪辫不仅联系着革命造反,也意味着归顺西方身体话语,辫子问题因而成为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以往对文化启蒙的理解和评价,侧重于国民精神的重造,立人、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自然欲望、个体价值、生命尊严等构成了文化启蒙的重要观念。实际上,身体的改变在启蒙运动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效力。最初、最直接、最广泛的启蒙效力,恰恰来自身体的重新塑造,从辫子、小脚、束胸、长袍马褂到短发、天足、天乳、洋装,完成了从“传统的中国人”到“西化的现代人”的身体转变。在清末和五四时期,身体的重塑可以理解为:身体,即观念,即启蒙。身体的重塑以修改民族身体、效仿西方身体为指向,这样一来,身体的重塑就必然引发内部的争议,也被拖入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话语圈套中。而身体革命的先行者(往往也是启蒙者),常常会遭到众人的讥讽排斥,承受屈辱的体验。也就是说,在身体的重塑中,启蒙与屈辱有着关联性。“假洋鬼子”的辫子,即是承载屈辱与启蒙话语的标志性身体符号,也是透视鲁迅文学创作动因的窗口。

二

鲁迅留学日本是在清末,正是中国深受殖民帝国宰制的时期,也是排满与维新观念高涨的时期,因此“假洋鬼子”的辫子不仅指涉“满汉的界限”,也指涉留日时期的被殖民体验。《藤野先生》借清国留学生形象把这两种观念编织在一起,这篇文章既是鲁迅对藤野的回忆叙事,也是鲁迅对自己留日生活和异国体验的总结,而后一内容为透视鲁迅的创作心理以及他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开启了别样的通道。在这篇作品中,有三个主观性的描述片段值得注意。一是速成班清国留学生的丑态描写,二是鲁

迅在仙台学医的成绩风波,三是幻灯片事件。三个片段看似不相关,其内在逻辑却指向鲁迅因“假洋鬼子”而引发的心理症结。

《藤野先生》开头两段文字描写了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②

《藤野先生》虽为回忆藤野先生的作品,开头两段文字却从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着笔。在简短的清国留学生印象记中,鲁迅置身其外对这帮留学生进行打量,描绘其丑态,表达了憎恶的情感。憎恶首先缘于“辫子”。在日本和西方国家,清国留学生拖着一条长辫子,被当作野蛮民族的象征,常常受到外国人的嘲笑^③。但是,剪辫容易引发同胞的责难。鲁迅1903年就因剪辫“受到几个盘辫子的学生的耻笑和监督姚文甫的斥责”^④,也令绍兴亲友骇怪,甚至一位族叔还打算去报官。“辫子”所招致的羞辱,应该是鲁迅嘲弄清国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因^⑤。把辫子盘在头上加以掩饰的折中做法,既顺应满清皇权对汉人的身体规训,又掩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这种“假洋鬼子”的心态和做法,更为鲁迅所不满。这些清国留学生特指“速成班”的学生。他们不大读书,热衷于赏樱花、学跳舞,把洋娱乐当“时事”来精通。失望于东京清国留学生的风气后,文章笔锋一转:“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别的地方就是指仙台。在正式叙述仙台学医之前,鲁迅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客死日本的朱舜水(曾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这顺带的一句并非闲笔,含蓄地表明了鲁迅对种族革命意识和民族国家身份的自我确证,进一步把自己与忘记辫子“血史”^⑥的速成班学生看作两类人。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

许多新鲜的讲义”^[9]。以上语段所构成的表意逻辑,隐藏着鲁迅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他有着种族革命的意识,是潜心研习西学的留学生,不是浅薄无聊、有损民族尊严的“假洋鬼子”,与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不是一类人。

对速成班清国留学生的描绘,潜藏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把它与后文的成绩风波和幻灯片事件联系起来看,会发现由民族身体和身份而引发的屈辱感贯穿了全文。藤野先生与鲁迅交流医学问题时,提到“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神的”,并打听中国女人裹脚的方式,这是“使我很为难的时候”。这里的“为难”可以理解为“难堪”、“羞愧”。有了这些体验作铺垫,对成绩风波的叙述就顺理成章了。鲁迅把因考试成绩而受辱的根源归到民族国家的头上:“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也无怪他们疑惑”这一短句以补充解释的方式,轻易谅解了殖民帝国的偏见,但鲁迅却不能谅解让他在日本人面前承受屈辱的国人。文章紧接着便说到了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事件中,给鲁迅带来民族屈辱感的是被示众的“愚民”和做看客的“庸众”。这一事件为什么让鲁迅特别感到难堪?东西方对日俄战争结果的态度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日俄战争虽然在中国的国土上展开,但当日本战胜了俄国,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欢呼雀跃,认为以往严重挫伤中国人自信心的种族优劣论,“因之以破。凡吾黄种人,其亦可以自奋矣”^[10]。日俄战争在当时被理解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种族之战,日本的胜利证明了亚洲黄种人(包括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黄种之前途,可以稍除障碍”^[11]，“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大异者矣,黄种之兴,其可量哉”^[12]。对于欧洲人而言,俄国的失败也是西方、白种人的失败,寓居中国的欧洲外侨认为,“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让他们“第一次在中国人面前丢脸”^[13]。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坐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课堂上的鲁迅,在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时,看到自己的民族同胞竟然给俄国人(白种人)做间谍,并被日本军人(黄种人)抓住示众,他所受到的刺激和承受的羞愧感该是如何强烈。这一事件因此成为鲁迅“弃医从文”、把文学当作启蒙工具的重要契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幻灯片事件的解读,沿着身体与精神二分的路子

进行,表达了通过精神启蒙来破解身体所带来的民族屈辱感的意向。

《藤野先生》既展露了鲁迅敏感的民族自尊,又隐藏着弱国子民的心态,二者的结合生发出沉重的民族屈辱感。然而,鲁迅把它转换为第三者(“假洋鬼子”和“庸众”)的过错,让自己变成间接的、无辜的受害者,变成国民精神的批判者,也就是“启蒙者”的角色。

《藤野先生》隐秘地表达了鲁迅的不满:“假洋鬼子”和“庸众”让他在异邦备感羞辱。然而,戴着假辫子的鲁迅1903年回国探亲,也被绍兴街上的人骂作“假洋鬼子”^[14]。因此,鲁迅对“假洋鬼子”的叙述态度不会是一元的,其中的心迹需要仔细辨析。由1926年的《藤野先生》回望20年代初鲁迅的作品,我们就能理解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为什么在启蒙知识分子与“假洋鬼子”、“庸众”之间展开,并对民族国家的文化性格进行了尖刻的讥讽。

三

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之类的人物,又是深受旧观念影响的民众加在他身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的复杂叙事姿态。

鲁迅被嘲笑为“假洋鬼子”,缘于辫子的有无和真假,对此,鲁迅应该是耿耿于怀的,故多次写到“辫子”问题,仅《呐喊》中的十四篇小说,就有三篇对辫子问题进行了发挥。鲁迅后来坦言深受“无辫之灾”,并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15]《头发的故事》就是一篇以“辫子”的真假和去留为题材的自叙传小说,其自传性和“舒愤懑”的性质,有《病后杂谈之余》一文和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作为佐证。^④小说抒写了鲁迅“所受的无辫之灾”与启蒙者的悲哀。小说是鲁迅的自叙传,但主人公“假洋鬼子”N先生在小说中并不是以第一人称出现,而是与“我”构成双声对话的“他”。鲁迅巧妙地利用了叙事者“我”所具有的间离效果,把自叙传变成“他者”的人生片段,让读者与

“我”一起来聆听“假洋鬼子”N先生讲述的“头发的故事”，并借N先生之口大胆袒露自己的心迹^⑤。“我”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只是引出和结束N先生滔滔不绝的言说，文字极少，小说的主体部分是N先生的独白，大段的N先生的直接引语，使得在叙述过程中作为“他”的N先生获得了类似于第一人称的讲述权力。如此叙事策略，把鲁迅情绪化的主体体验包装成了他人的故事，在叙事者所造成的隔离效应中，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抒写洋派知识分子的反叛、两难与屈辱，并表达愤激之意。《头发的故事》既满足了曾戴假辫的鲁迅“舒愤懑”的需要，又借“头发的故事”表达了启蒙知识分子与“庸众”、学生的关系，在关系中吐露了半殖民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屈辱与荣光、抗争与犹疑。

剪掉辫子的N先生回到家乡，无论戴不戴假辫子，无论穿洋装还是大衫，都遭到乡人的讥讽嘲笑，被骂作“假洋鬼子”，于是手里添了一支手杖，拼命打了几回路人，他们才“渐渐的不骂了”。以西洋文明棍敲打路人这件事让N先生感到“悲哀”，因为洋人/殖民者也是这样对待中国民众。可见，“假洋鬼子”与民众的关系，类似于洋人/殖民者与中国民众的关系——既是推动中国“向西转”的启蒙者，又为民众所敌视。“假洋鬼子”/启蒙者为此承受了不少的“冷笑恶骂”和猜疑排挤。“假洋鬼子”/启蒙者深知既有势力对变革的仇视，剪辫子的学生将受到社会的惩罚，于是当学生问监学N先生：他们要不要剪辫子？N先生既说“没有辫子好”，又劝他们不要剪辫子。N先生是有着二重思想的“假洋鬼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自己剪辫子，把剪辫当作革命，又不同意学生剪辫子，却还要感叹“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绝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⑥。不过，由于N先生在独白中提到辛亥革命的流血牺牲，提到《革命军》作者邹容的抗争和就义，因此“假洋鬼子”形象就向革命与牺牲的历史意义靠拢，获得了言说的正义性。但是即使到了民初，“假洋鬼子”与民众仍然相互隔膜，曾被“假洋鬼子”用文明棍敲打的“庸众”，曾被“假洋鬼子”劝告不要剪辫子的学生，有多少人会记得“假洋鬼子”们为社会变革历经的艰辛、承受的屈辱和做出的牺牲呢？这正是“假洋鬼子”们的悲哀，也是他们的愤懑所在。^⑥

奇怪的是，《头发的故事》中的“假洋鬼子”N先生

被认为是与庸众、旧势力相拮抗的启蒙者，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钱少爷却被当作负面的、可笑的、反动的形象。这种区别对待是否符合鲁迅的创作初衷？如果联系鲁迅曾被当作“假洋鬼子”的屈辱体验和相关作品，可以推想鲁迅对钱少爷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只是形象的复杂性被小说的“冷嘲”笔法掩盖了。仔细辨析，钱少爷甚至存有“新人”的一些可贵品性。例如：从东洋回来后，钱少爷的“腿也直了”，对照阿Q被审讯时习惯性的下跪，“腿也直了”可以解释为留学后身体奴性的解除；钱少爷的革命就是跑到静修庵砸碎“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然而，《在酒楼上》中的新式知识分子吕纬甫的革命行动也不过是“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钱少爷不准阿Q革命，《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同样不准学生剪辫子。“假洋鬼子”钱少爷之所以被误解为“深恶痛绝”的可笑人物，是因为人们把阿Q看待钱少爷的态度当作鲁迅的态度。实际上，阿Q就是被批判的人物。周作人认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⑦。沈雁冰认为，阿Q形象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⑧。冯雪峰认为，阿Q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⑨。这样的阿Q，他对钱少爷的态度怎能代表鲁迅的立场？流行的看法——鲁迅对阿Q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并没有史料依据，属于一种主观阐释。^⑩既然鲁迅不是把阿Q当作值得“同情”的人物来塑造，那么，在阿Q的聚焦中所呈现的“假洋鬼子”形象，我们对之的评价就不能以阿Q的立场为标准。

小说内未提供评价“假洋鬼子”的价值参照体系，我们只有向外寻求价值的尺度，参照作者体验，从互文性的层面来理解“假洋鬼子”钱少爷。我们可以把钱少爷看作《藤野先生》中的清国留学生与《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的合成。从钱少爷的出场来看，《阿Q正传》显然是把《头发的故事》中的类似情节重写了一遍：穿着洋服，戴着假辫子的N先生被乡人嘲笑为“假洋鬼子”，他愤而以手中的文明棍击打骂他的人；阿Q路遇他深恶痛绝的“假洋鬼子”钱少爷，咒骂钱少爷“秃驴”，钱少爷挥着“黄漆的棍子”照着阿Q的头噼噼啪啪打了几下。由于从“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可笑的阿Q的视角来聚焦“假洋鬼子”钱少爷，因此钱少爷的形象被戏谑化，包含的相关信息也

使得钱少爷接近清末小说和《藤野先生》中的同类形象,如在东洋只待了半年,辫子是被别人强行剪去的,因剪了辫子不能在满清做官了,与赵秀才合流,对革命的理解只是砸龙牌。周作人说鲁迅大概要借钱少爷的形象“倾吐一下对于这一种人的反感”^[21],这让我想起鲁迅对《藤野先生》中的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的态度。但是,另外一些信息又使得钱少爷接近启蒙者N先生,如进过洋学堂,到日本留过学,从东洋回来腿也直了,剪掉辫子的他被阿Q当作“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为未庄的人所不容,向“闲人”宣讲革命。

鲁迅说《阿Q正传》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然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故写出的只是“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22]。由此可以推断,钱少爷形象与鲁迅“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建国认为,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一词“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23]。此说新颖独到,但只看到鲁迅态度的一面。结合鲁迅被当作“假洋鬼子”的屈辱体验,以及《头发的故事》《藤野先生》《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中的“假洋鬼子”或“新旧合流”的知识分子形象,我认为鲁迅对“假洋鬼子”钱少爷的态度是复合型的,既包含对为民众所嘲弄、所排斥的作为启蒙者的“假洋鬼子”的自嘲,也包含对模仿洋人皮相的“假洋鬼子”的“他嘲”,还包括借戏谑的文本风格来“舒愤懑”。

四

谈论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需要考虑中国的半殖民文化语境,需要进入此语境下鲁迅的经历和体验。而且,不能孤立地看待鲁迅笔下的钱少爷、N先生、短期班的清国留学生等“假洋鬼子”形象,而应把具体的形象置于有关“假洋鬼子”的文本系统中来分析,这样才能接近鲁迅的创作初衷。鲁迅笔下“假洋鬼子”形象的独特和多样,既有时代的原因,更与鲁迅特殊的经历有关。在清末时,鲁迅有过被世人当作“假洋鬼子”加以奚落和排斥的心酸体验。鲁迅进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就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为当时社会所鄙夷

的,因为只有走投无路的儒生才习洋务,“将灵魂卖给鬼子”^[24]。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鲁迅明显感觉到社会对他的警惕和排斥,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即是鲁迅作为“假洋鬼子”的自叙传,溢满了两难和愤懑的心绪。总而言之,由半殖民中国带来的屈辱体验以及对半封建中国进行启蒙的愿望,是鲁迅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也是理解鲁迅笔下“假洋鬼子”形象的关键。

屈辱与启蒙的关联性,潜藏着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隐秘动因。鲁迅说他写起小说来,缘于不能忘却旧日的寂寞、苦痛和幻灭^[25],于是抱着“启蒙主义”,揭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良人生的目的^[26]。这也成了研究界的一种共识。但我认为,从心理动因来看,鲁迅做小说是缘于屈辱体验,屈辱体验是鲁迅文学启蒙的触机。鲁迅做小说的“来由”,在《〈呐喊〉自序》中“约略说过”^[27],归于一句话就是“不能全忘却”。不能忘却什么呢?鲁迅列举了他遭遇的家庭、学业、民族国家三个层面的屈辱:一是家道中落后世人的冷眼,二是“学洋务”的不光彩,三是幻灯片事件让他在日本人面前丢脸。鲁迅遭遇的三个屈辱事件,后两个联系着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境遇。鲁迅的屈辱属于在半殖民中国“向西转”的初期,“学洋务”、留学外洋的知识分子必然遭遇的屈辱,在家道中落、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甚。屈辱的记忆既是鲁迅弃医从文的触机,也是他不能忘却而写小说的动因,通过《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的对照阅读,即可得到印证。

半殖民地的屈辱体验既是鲁迅思想启蒙的触机,又转化为启蒙叙事的资源,并在叙事中以启蒙者的姿态修复精神的创伤。最终,屈辱与启蒙的吊诡关系得以完成。

注释:

- ① 参见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208页。
- ② 参见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 ③ 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提到N剪辫后,“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他,因此鲁迅对盘辫子的清国留学生的丑化,有借回忆“舒愤懑”的意味。

④ 参见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8-199页。

⑤ 鲁迅的杂文《病后杂谈之余》(1935)第三部分与小说《头发的故事》(1920)讲述的内容基本相同,杂文是鲁迅自述经历,小说把这段经历的言说主体设置为N先生。年代不一样,言说的话语环境也不一样,故鲁迅在五四时选择小说这种虚构性的文体并借第三者的口吻来讲述“头发的故事”,而30年代采取纪实的杂文来直接表达“无辫之灾”的经历。

⑥ 参见李永东:《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构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2][14]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98、198、199.

[3][4][8][15]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4、193、193、194-195.

[5] 孔飞力,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2.

[6][9]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3、314.

[7]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4.

[10] 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1904(1).

[11] 闲闲生.论中国责任之重.东方杂志,1904(1).

[12] 祝黄种之将兴(录甲辰正月中外日报).东方杂志,1904(1).

[13] 布莱恩·鲍尔,刘国强译.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5.

[16] 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8.

[17] 周作人.关于阿Q正传.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12.

[18] 雁冰.通信栏.小说月报,1922(2).

[19] 冯雪峰.论《阿Q正传》.新华月报,1951(11).

[20] 冯传亭.浅谈鲁迅先生对阿Q的情感态度.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1).

[21]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9.

[22]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4.

[23] 史建国.鲁迅与“假洋鬼子”.书屋,2004(7).

[24][2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437-439.

[26][27]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525.

编辑 阮凯

“朝鲜半岛危机: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简讯

8月30~31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周边国家研究——“朝鲜半岛危机: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高建华教授、校学位委员会主任苏智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边研究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沈志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于洪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韩献栋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就“韩国与朝鲜”、“美、日、俄与朝鲜”、“中国与朝鲜”三个分论题展开深入的交流与讨论。高建华副校长特别强调,上海师范大学大力支持和运用文科的初衷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学者研究的智库功能,努力推动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各层级政府决策服务。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最近一个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异常紧张、复杂、迷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这里涉及一些根本的认识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如何看待朝核危机的实质以及半岛周边国家对此的立场和方针,如何从全球角度看待东亚局势,需要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入分析。本次研讨会上诸多该领域专家一起当面交流切磋,旨在对朝鲜半岛问题有正确认识,为国家的决策提供认知基础和学术支撑。会议闭幕式上,沈志华教授总结本次研讨会主旨为“我们从学术上、学理上提供一个认知朝鲜半岛问题的基础”。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马英娟教授展望,“这次的研讨会的成果不仅会深入关于朝鲜问题的研究,也会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产生积极影响”。